

小说精选

[茉莉卷]

《三岔口》/叶广苓

《窥伺》/张笑天

《巨兽》/陈应松

《轮盘赌》/杨少衡

《寻思无门》/王祥夫

《美发》/刘庆邦

《养父养母》/衣向东

《夜深沉》/何玉茹

《逆时针》/徐则臣

《白花》/罗伟章

《羽叶莺萝》/于晓威

小说精选

[茉莉卷]



内蒙古出版集团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说精选·茉莉卷/叶广岑等著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
人民出版社, 2010. 9

ISBN 978 - 7 - 204 - 10700 - 1

I. ①小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88215 号

小说精选·茉莉卷

叶广岑等 著

责任编辑 王东生 王继雄

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 15

字 数 20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4 - 10700 - 1/1 · 2195

定 价 29.80 元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 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目 录

三岔口	叶广苓 001
窥 伺	张笑天 028
巨 兽	陈应松 034
轮盘赌	杨少衡 074
寻死无门	王祥夫 086
美 发	刘庆邦 124
养父养母	衣向东 133
夜深沉	何玉茹 166
逆时针	罗伟章 176
白 花	衣向东 213
羽叶芎萝	于晓威 226

三岔口

■文/叶广苓

1

少年时对革命向往异常，至今尚未疲惫，不同的是多了些成熟与理性。

幼年的我成天盼着打仗，想的是若能赶上红军长征，赶上八路打日本，赶上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，我一定是红军，是八路，是解放军。只可惜，生不逢时，解放军们在东北、在淮海、在平津地区浴血奋战的时候我还在穿开裆裤，没有参战的资格。我读小学二年级时，暑假学校组织读书会，每人发一本小册子，让大家在树底下围成一圈，轮流朗读。册子上说的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，册子封面的刘胡兰昂首挺胸，目光炯炯，嘴唇紧紧地抿着，短头发被风吹得扬起，英俊而潇洒。扉页里有毛主席的题字：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。”那字写得比我们终日描红的字体漂亮多了，流畅而舒朗，跟刘胡兰的头发一样，高高地飞扬着。画面上刘胡兰的脖子硬硬地梗着，很长，很美。我想，敌人用铡刀把这个美丽的脖子切断了，刘胡兰一定很疼很疼。明明知道疼还在坚持，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，若换了我大概不会如此镇定，至少我不会把脖子亮得这样开，因为那是“数九寒天下大雪”的日子。

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敬佩刘胡兰，认为她是天下最坚强最伟大当然也是最勇敢的女性，她是烈士，不是凡人，她离我们很遥远，可望而不可及。我的特点是喜欢把我崇拜的人随时向人介绍推荐，比如花木兰，比如诸葛亮，比如孙悟空和武松，但他们都不能和刘胡兰比，因为他们都不是被敌人杀害的，刘胡兰

是被“勾子军”当众杀死在村口的，临死还怒斥敌人，所以刘胡兰是我的崇拜之最。

崇拜的具体表现是将封面的刘胡兰在图画纸上临摹放大，然后拿到老七那儿去上颜色。老七是我七哥，是画家，他有这个本事。但是我的要求遭到老七拒绝，老七说这是版画，版画是要套色的，不是用颜料往画上涂的。道理说了不少，反正是不给上色。他不给上色我自己上，我上色的本事自信也不比谁差，我们家里的很多照片都被我描成了彩色。那时候还没有“彩照”一说，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，想要彩色照片么，照相馆有专门上色的师傅，也卖涂抹照片的专用颜料。我曾经用那些颜料将父亲工作证上的照片涂成了蓝脸，父亲看了说他成了《西游记》里的妖怪“奔波儿霸”了。我也将穿着婚纱的老二媳妇照片做了涂抹，给新娘子涂上了红嘴唇，使新媳妇像刚吃完人肉的夜叉。那种颜料是洗不掉的，害得老二媳妇再也不跟我说话了。那天我拿着画像到母亲那儿去告老七的状，母亲看着刘胡兰的画像说，这不是你三姐么！

我说这是刘胡兰。母亲说，我以为是你三姐呢，你三姐就这个模样。

我这才想起自己的三姐姐也是被反动派杀害的，与刘胡兰不同，不是铡死是活埋，就埋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城墙根底下。敌人没用铡刀，连子弹也省了，挖个浅坑，让人躺在里头，盖上土就完了。后来听说行刑的时候是在黎明，天将亮，非常的秘密，不像电影里演的，周围有乡亲，还有大狼狗，他们四周什么也没有，只有黑沉沉的城墙和寒冷的北风，他们也没喊口号，连点儿声息也没有，静悄悄地死了。杀了他们没几个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，用书上的话说是他们“已经见到了黎明的曙光”。解放以后政府通知我们家去收尸，是母亲和老七去的，两人回来一身土，两脚泥，眼睛通红，连厨子给熬的小米粥也没喝一口。母亲对父亲说，三丫头的尸骨已经腐烂，无法辨认，地上三排亮着几十具遗骸，都用草席盖着，鼻子眼睛烂成了黑窟窿。

后来母亲是从一只没有烂完的鞋上认出三姐的。那是一只千层底的黑布鞋，鞋上绣了一朵小梅花，是我们故去的第二个母亲的手工，三姐离家的时候穿的，走的时候跟母亲说是上西山郊游，特意脱下皮鞋换了布鞋，一走就再没有回来……

烈士们的遗体由国家统一安葬了，三姐没有埋在烈士陵园，而是被父母提出，埋在了自家的坟地里，小小的一个土堆，连墓碑也没有。除了门框上挂着的“革命烈属”那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，我的三姐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任何痕迹。父母亲在处理三姐的后事上相当低调，他们退回了那一笔相当可观的抚恤金，说这钱是闺女用命换来的，花着伤心……不要。

我跟同学们说我的三姐和刘胡兰一样，也是为革命牺牲了的，同学们不以

为然，尤其是那些“革命的后代”们，他们认为刘胡兰就是刘胡兰，谁与刘胡兰比谁就是不自量！我心里不禁暗暗为我的姐姐叫屈，都是死了的，怎的就没人知道她，毛主席怎的就不给我的三姐题字呢？

小学校的隔壁是某机关大院，同学中不乏干部子弟，他们自成圈子，玩的游戏，谈论的事情也和我们不一样。他们视我们玩的“跳间”、“拽包”、“抓子儿”为不屑，称我们为“胡同串子”。胡同串子是不能和干部子弟相提并论的，子弟们的优越感显而易见，连老师跟他们说话也特别的轻柔，特别的小心。胡同串子们动辄便被班主任高玉琴“请家长”。我们的家长也很不值钱，老师一叫，赶紧屁颠儿屁颠儿地来了，孙子一样地听训，回家对“串子们”便是一顿臭揍。老师不敢请干部子弟的家长，他们的父母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，我敢说，哪一个都比校长级别高，更别说我们那个班主任高玉琴了。

有一回到北海过队日，雷小蕾提出她的爸爸也要参加。雷小蕾的爸爸是大官，大官参加女儿的队日，本身有点儿怪，这事搁“胡同串子”身上是绝无可能的，甭说我们的爸爸想不起参加我们的队日，就是想起来了也不会跟着一群孩子瞎起哄，白耽误工夫。对雷小蕾爸爸的要求高玉琴老师竟然答应了，还有点儿受宠若惊，还给校长汇报，这让我很看不起她，因为她对“子弟们”的要求从来不敢拒绝。第二天我们举着中队队旗步行到北海后门，雷小蕾的爸爸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雷小蕾的爸爸隔着马路向我们招手，雷小蕾自豪地说她爸爸是坐专车来的。我说我父亲过去也有专车，大马拉的专车，带丝绒座玻璃窗，是从外国进口的。雷小蕾想也没想就说，你爸爸原来是赶大车的呀！

正巧，过来一辆骡子拉的大车，车上装满煤炭，赶车的人和拉车的骡子都是眉目不清，黑头黑脑的，“子弟们”便指着车说那是我爸爸。更有多事的大声喊：是赶车的还是拉车的呀？

众人一阵哄笑。

掏尽三江水，难洗一面羞。其实都怪自己少不知事，自讨没趣。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以后，我便明白了自己在人群中属于另类，得随时收敛着，蜷缩着，不能逞强。明明是把“全聚德”烤鸭店的师傅叫到家里做烤鸭子，也得说“压根没见过熟鸭子是什么模样”；明明老张是看门的，莫姜是做饭的，刘妈是打扫屋子的，跟同学们也要把他们说成是“院里邻居”。在性格和心灵上都有些扭曲。这种扭曲一直延续了我的大半生，铸就了我内向、不合群的性情。就是在今天，独处时往往觉出难耐的惆怅，混迹人群，谈笑风生中，内心深处也常常泛起难堪的孤独，由不得自己，是小时候坐下了病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雷小蕾的爸爸穿着一身将校呢，背着一架照相机，笑眯眯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。有谁问雷小蕾她爸为什么没戴肩章领章武装带，雷

小蕾说，大官不用戴人也知道是大官。

雷小蕾爸爸参加队日的目的是照相。他的大照相机炮筒子一样，咔嚓咔嚓在我们周围响个不停。慢慢地我便窥出了端倪，大官的相机专门对着的是他的女儿及个别干部子弟，根本没我们这些“胡同串子”什么事儿，当然我也就不必上赶着往前凑了。我自小就是敏感的，我知道我是谁。

这个队日过得心里有点儿别扭。

几天后雷小蕾把过队日的照片拿到班上 come 显摆，有划船的，有荡秋千的，有吃冰棍的……大家传着看。照片里，雷小蕾绝对是“女一号”，我们则是芸芸众生，是陪衬。班主任更惨，照了半张脸。就这，高玉琴老师还一个劲儿说，照得好，可以留作纪念，过五十年你们再看，有意思得很呢。

可惜，还没过十年，高玉琴就死了。

我想如若我的三姐活着，我自然也属于干部子弟了，我的三姐即便不是大官也得是个国家干部，这样我和我的那一帮芸芸众生的“胡同串子”们也不至于沦落到跟假山、大树、九龙壁一样，充当背景的地步。

三姐身后的冷寂，胡同串子的低贱，班主任的巴结，让我失落，在二年级小学生的心里拧成了一个结。现在看，微不足道，但在当时却是郁闷得厉害，觉得自己掉价极了，回来便跟父亲哭闹，问他怎的不当红军去长征？在那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，人家的爸爸都去革命了，他非要泡在家里，接二连三地生一堆孩子，简直是莫名其妙。

父亲被我纠缠不过说他也当过大官，而且是中央级别的，比雷小蕾爸爸的官大多了。我问什么官，父亲说是镇国将军。

母亲一听赶紧把我拉开，说不要听父亲胡说，那都是父亲瞎编的，并且告诉我，这样的话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，万一人家较起真来，咱们可担当不了。其实父亲没有胡说，还真是个“镇国将军”，不过这个将军不是共产党任命的，是清朝皇上封赏的。我祖父是镇国公，世袭罔替，代降一等，到了父亲这辈就成了镇国将军。我说，有这个将军比没有还让人恶心，寒碜也把人寒碜死了，我哪里会出去说！

父亲从来是不急不慢的，对我这个老闺女绝对有耐心，揪着我的小辫子说，阿玛也是当过红军的……

我眼睛一亮，扑在父亲怀里，揪着他的胡子说，真的呀？

母亲对父亲嚷嚷：越说越离谱了啊！

母亲将我从父亲的房间拉出来，带到厨房，给了我一块大糖瓜，这糖瓜本来是准备过年给灶王爷上供的，让灶王爷的嘴被糖粘上，在玉皇大帝跟前说不了坏话。现在母亲把糖瓜给了我，想的是把我的嘴也粘上，再说不了“镇国将

军”一类的是非。为了解开我心里的结，母亲安慰我说，谁说咱们不是干部子弟，谁说咱家没大官，你的表兄小连那不是大官又是什么？

2

小连的确是大官。

小连的官大得让我不知道有多大。

有一回小连上我们家来，提前半小时，整条胡同都戒了严。一会儿，三辆小车停在了门口，呼呼啦啦下来一帮人，进来的只有小连一个。

我那是第一次见小连，很普通的一个人，个子不高，白净面皮，穿着灰中山装，披着呢子大衣，说话带着南方口音。其实他是地道北京人，搁先前也属于“胡同串子”范畴，不知怎的，一当了官连说话都变了。母亲迎了出去，站在垂花门的台阶上给小连请了蹲安，客气得简直都不像我的母亲了。后来小连走了她又反思这个安请得不对，小连是晚辈，他应该管母亲叫舅妈，哪有舅妈给外甥请安的道理。说白了是母亲没见过官，甭管是谁，只要是官，自己的心里先怯了三分，这也是穷人心态。她那朝外南营房的贫民出身，让她对一切官员都有着本能的避讳和谦恭，官大一级都能压死人，更何况母亲没级，小连在她眼里就是她这辈子见到的最大的官了。依着规矩，母亲应该站在垂花门里，正屋的廊子上迎接客人，不该到二门外头去抛头露面，而且是为一个外甥，真值不得！这份儿跌大了。

母亲没我端得沉稳，我站在屋门口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小连随母亲走上台阶。小连看到了我，摸着我的头问我是谁，小连那态势绝对是大官接见群众的亲民态势，我在新闻电影上看过，一点儿也不新鲜。母亲赶紧说，这是老闺女，小名叫丫丫，你舅舅六十岁才得了这个，宠得什么似的，没一点儿规矩。

母亲说我没规矩，我便越发的没规矩，主要是她在外人跟前说出了我的小名，这让我觉得很没面子。我对灰中山装说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小连，你哥是大连，你们家住在细管胡同三号。

母亲说，这孩子人来疯，动辄就犯浑，跟死了的老五一个德行。

小连说，丫丫长得像三表姐。

小连说的是在德胜门城根儿被活埋了的那个，母亲说的是被父亲赶出家门在后门桥冻饿而死的那个，都是死鬼，就是说我像死鬼，这更让我不快。我看得出，小连对我的亲切和笑意都是装出来的，假模假式。小孩子一般都有这种直觉，就像狗，谁对它是真好假好，它不是凭眼光，是凭感觉。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对小连没什么好印象。

在这里恕我将小连的正式名字隐去，父亲生前反复强调过，不要提及和小连的亲戚关系，免得给人家造成被动。我说，这样伟大的亲戚有跟没有一个样。

应该说这个家里那天拿得最稳的是父亲。父亲不愧是有“镇国将军”称号的，静静地坐在书房里等着外甥的拜见，手下一幅《鹁鸽石榴》的工笔连停也没有停。按常规，小连这样的官来了，父亲会安排在客厅见面，但小连是父亲姐姐的儿子，在客厅见面就显得太郑重太见外，毕竟是小辈，犯不着那样大动干戈。甥舅在书房相见随和又不失身份，挺好。

小连一掀门帘进了书房，伟大的官员把大衣一扔，没忘了给我父亲请安。这让我看着有些怪诞，我想他再共产党，在叶家也是外甥，这怕是改变不了的。

“半世总为天外客，一家今是故乡人。”小连在书房里跟父亲谈了些什么我无从得知，连母亲也很知趣地回避了。其间母亲进去送了一次茶，出来对我说两个人都在掉眼泪。大官还会哭，父亲还会哭，这是我不能理解的。官面上的小连从来都是正面须生的形象，冠冕堂皇，不苟言笑。有一次我和父亲参加政协的新春联欢会，在会上见到了小连，他扫了我一眼，竟然不认识一般地从我跟前走过去了。那张脸，那作派，是绝对的正儿八经。但只有我知道，在正儿八经的背后，他在父亲的书房里偷偷哭过。这个秘密我没对谁说过，说出来怕人家不信，闹不好就跟说我们家马车似的。

父亲是政协委员，有人说这与小连绝对有关系，但父亲否认这一点，他说小连不会将私情与政治混为一谈，小连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，他对他亲兄弟大连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那时候大连还关在监狱里，是共产党的监狱。

3

在说大、小连之前有必要先说说我的姑姑，那是被我称为姑爸爸的一位女拿破仑式的“人物”。

自尊自信，敢作敢为，刚愎自用，自作聪明，满族的姑奶奶，厉害。

这厉害不是在婆家，是在娘家。姑爸爸在我们家绝对是说一不二的“皇太后”，绝对是没有谁敢惹的伏地圣人。满族人各家都有姑奶奶，各家的姑奶奶在婆家都低声敛气，给男人洗衣裳，给婆婆装烟袋，给儿女纳鞋底儿，比孙子还孙子。可姑奶奶们一旦回了娘家，立刻横挑鼻子竖挑眼，说话都是高八度的，除了不讲理之外就是出些异想天开的怪想法，成心难为兄弟媳妇，以示她在这个家庭里永远不可更改的重要地位。老舍先生在他的小说《正红旗旗下》把满族姑奶奶写得淋漓尽致，我们家的姑奶奶与老舍小说里的姑奶奶相比有过之而无

不及。至今我的相册里保留了一张上世纪二十年代的“全家福”，坐在正中间的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我的姑爸爸。姑爸爸目光镇定，正襟危坐，那神态绝对是慈禧再生，弥勒佛转世，透出一股舍我其谁的霸气。

有一年正月初二，姑爸爸回娘家，雇了一辆洋车。车夫好心，给腿上盖了条毯子，一路上姑爸爸都没说什么，到了我们家门口，不干了，非说毯子里有虱子，不给车钱，还要拉车的找补拆棉袄的工夫钱。明摆着，这架是吵给娘家人看的。我母亲赶忙出去说好话，替给了车钱，恭恭敬敬将姑奶奶请进屋来。姑奶奶在门外头闹完了到家里接着闹，嫌父亲第二个妻子张芸芳躲在自己屋里不露面，跟她摆谱。母亲说张氏已经病得起不来炕了，姑奶奶说，除非她是在气，认不得人了，否则就是成心气我，成心跟我较劲。一个小妾，还不知自己的斤两了，她以为她是谁？是一品夫人么？告诉她，就是她死了，在叶家的坟地也是靠边单另埋着的，立不立坟头还得另说着。

大过年的，姑奶奶这些话明摆着是找碴儿，忒不吉利，可谁也不敢说什么。我母亲出身低微，在大姑子跟前得随时伺候着，赔着小心，屁股不敢全落座，挂了椅子一个边，时刻瞅着大姑子手里的水烟袋。人家抽完了一口，她得挑选最佳时机把纸捻给吹着，不能急也不能慢，急了是催人，慢了让人等。在大姑子面前她不能说太多的话，可又不能冷场，她得在大姑子挑眼蹭棱子的间隙，提那么两句使大姑子高兴又有兴趣的话说，一不留神把姑奶奶惹翻了，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。并且姑奶奶随时准备着翻，姑奶奶在婆家翻不了也不敢翻，到娘家就是专门翻来了。我姑爸爸本来就是大宅门的格格，作派大脾气也大，她一到我们家，我那些哥哥姐姐如同避猫鼠，全都溜得没了影，只剩下母亲和她周旋。

姑爸爸嫁的是城东“掌档子拨什户”的富察氏，是成贝勒给做的媒。富察氏辛亥革命以后改姓傅，我后来查过官档，“拨什户”不是什么大官，但是挺有实权，是专管发放钱粮的官员。可惜“拨什户”死得有点儿早，平日姑爸爸又大撒把过日子惯了，没什么积蓄，孙中山一革命，铁杆庄稼完了，日子就有点儿难。姑爸爸不但有婆婆，还有一个不曾出嫁也不想出嫁的大姑子，大姑子和婆婆，一个是刁钻古怪，一个是古怪刁钻，两个人每天轮着叨叨埋怨，北屋怨声刚歇，东屋骂声又起，不是嫌小酱萝卜咸就是嫌笤帚搁的不是地方；不是北屋的“贼猫”偷吃了萨其马，就是西屋赤金手镯不见了踪影……反正总有资料随时提供。我的姑爸爸带着两个儿子，伴着两个多事的老太太过着憋屈的日子，大宅门格格的架子自然也收敛起来。姑爸爸的大儿子在农商部当录事，挣的薪水不够他自己折腾，小儿子正在念高中，听说书念得不怎么样，女朋友倒是交了不少，属于“花花公子”系列。父亲每季都让我们家老大往细管胡同

送钱去，但姑爸爸和她的婆婆似乎并不领情，倒驴不倒架，穷横穷横的，连句客气话也不说，好像我们家上辈子欠着他们的。

母亲见姑爸爸喝了第二道茶，有了点儿喘气的机会，便小心翼翼地问：大姐您想吃什么？厨子老王在外头候着呢。海参、鲍鱼年前就发好了，口外的小蘑菇也预备着呢，羊肉是从德胜门羊店挑来的西口肥羊，让羊肉床子的人新宰的，专给大姐留着。外甥们爱吃的酱羊肉，三十那天让前门“月盛斋”送来了二十斤……

姑爸爸说，我什么也不吃，我吃气！

母亲又不敢说话了，她知道，大姑子的脸还没有翻完。可不么，在婆家受了一年气，姑奶奶过年回来要不发脾气，那就不叫过年。继而姑爸爸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我的父亲，说，瑞祓（我父亲）还没信么？

母亲说没有。姑爸爸说，走了一年多了，连封信也没有，他打的是什么主意？他不要这个家，我还要我的儿子呢！

姑爸爸指的是我父亲带着小连上江西的事。我父亲除了画画以外，最有趣的是研究古代窑址，应该说这是业余，后来竟成了他的专业。既然研究古代瓷窑，景德镇便是不可不去的地方，就这样带了外甥小连奔江西去了。说是月余便归，但以父亲的闲散性情，徐霞客式的游逛方式，注定了他信马由缰的行程。走到哪儿了，无人知晓，他也无需禀告。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是“自由而舒展的行走，是对心灵的一种放飞”。我的父亲崇尚自由，一辈子自由，解放后划的成分是“自由职业者”。

名为自由，其实是对家人极端的不负责任。

姑爸爸见我父亲没回来，自然也找不回她的小连，就数落叶家十几个孩子一个也不在家，偌大院落被我母亲整治得冷冷清清像座庙，没点儿人气儿，她在家做姑娘的时候叶家可不是这样……继而又对仆人刘妈不满，说刘妈一个老妈子穿什么绣花缎鞋，下人没个下人样，莫不是想造反？陈胜吴广还没当皇上呢，且轮不到她！巴儿狗玛丽也不合她的心，说狗没个狗样，长得塌鼻扁脸，像是当着门面挨了一巴掌，把整个脸打回去了……这都是不祥之兆，掌门当家的跑没了影儿，大过年的带着外甥在外头野逛，败家之象……

姑爸爸逮着什么说什么，看见什么说什么，想起什么说什么，对娘家的一切都非常非常地不满意，非常非常地有看法。

太阳偏西，正月初二的省亲到了尾声，吃过中午饭，喝了一壶香片，垫补了半碟点心的姑爸爸该回婆家了。看门老张早早儿给雇好了车，装满了整整一车年货，姑爸爸腰里也揣着我母亲给的硬邦邦的一沓票子，都是没使过的新红票，最终脸上总算有了点儿笑模样，临上车对母亲说了句恭维的话：你长得比

瑞被那个死了的瓜尔佳看着顺眼多了。

大正月的在母亲面前提起父亲去世的前妻，不知是添彩还是添堵。

后来姑爸爸彻底和我们家翻脸了，再不来往。原因是我父亲从江西回到了北平，却把她的儿子小连弄“丢”了！京剧有《失子惊疯》一出戏，是说妇女胡氏在山中遇强盗，将儿子遗失，伤心至极而成疯癫，我的姑爸爸虽然没有疯癫也是一病不起。她不能原谅我的父亲，但她又说不出什么，不回来是她儿子小连自己的选择，有书信为证，跟我父亲没有关系。

以后逢年过节姑爸爸不再回娘家，改由我父亲或是母亲过去看望她。把人家的儿子带出去却没带回来，我父亲总觉得愧对他的姐姐，由此对姐姐的家更为关照。在小连回北京“认母”之前，我父亲在姑爸爸跟前一直跟三孙子似的。

姑爸爸在叶家如此折腾时我还没出生，我见到姑爸爸是在十几年以后，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。一个干瘦的老太太，提了点心盒子到我们家来，穿着簇新的带有樟脑味儿的衣裳，刨花水把头发抿得油光水滑，一丝不乱，脑后头的小纂儿上插着一根白玉簪，脚上穿着一双锃亮的小皮鞋。母亲告诉我说是姑爸爸到了，话语间满是受宠若惊的成分。姑爸爸满头银发，脸上白净而平整，说话声音很低，很柔和，全没有母亲叙述的那些张扬与矫情。母亲张罗着沏茶倒水，姑爸爸竟然站起身来接，一口一个美珍地叫着我母亲的名字，好像是嫡亲嫡亲的姐儿俩。谈话间知道，姑爸爸在给工艺美术厂画彩蛋，她的大姑子在街口摆摊，日子勉强维持，依旧是不富裕。那次姑爸爸来找父亲，是让我父亲到政府去打听情况，说她的儿子小连一走十几年，现在太平了，儿子若是在，怎的也会回来看看老妈的，那是个仁义孝顺的孩子。若是不在了，政府也应该像对我三姐那样，给家属有个说法。现在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当妈妈的怎能心甘！

应该说姑爸爸提出的要求很合理，我父亲绝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。听了老太太声泪俱下的倾诉，我对眼前瘦小枯干的姑爸爸充满了怜悯之心，甚至想让父亲将老太太接回家来，让她在娘家颐养天年，将来由我和我的哥哥们为老姑奶奶养老送终。

父亲说，怎么可能，这里边有个自尊的问题，你姑爸爸是个要强的人。

4

要强的姑爸爸却没养个要强的儿子。

解放军一进城，原本在旧政府干事的大连依旧按原职被新政府录用，一切照旧，甚至连办公桌也没换。但是大连不干了，他嫌共产党要求太严，动辄开

会学习，动辄汇报思想，他没那么多思想可以汇报，最主要的是他不愿意让谁管着他。以前在旧政府干事，早上九点上班，十点到岗，温暖的大办公室，明亮的大玻璃窗，茶房早早地给沏好了茶，把桌子擦抹得一尘不染，恭候着他的到岗。他的任务是誊录公文，可是这公文有时一个月也下不来一件，偶尔下来也是三言两语，十分钟就誊完了，许多闲散的时间无法打发，就看《梅花易术》，给人看手相、算命，一天到晚云里雾里地神说。反正大家都没事干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共产党一接管，首先茶房取消了，得自己到锅炉房打开水，八点上班得准点到，在签到簿上画钩，一进办公室文件就山一样地堆在桌上了，别说《梅花易术》，就连窗户外头的梅花树他都没工夫抬头看一眼了。这哪儿成，借着上边要求他们学习打字的机会，他就把工作辞了，说闻不了打字机的机器味儿，一听那啪嗒啪嗒的声音就想撒尿。说不干就不干，在家闲了两个月又觉得很无聊，首先是手头不宽裕，想听个戏，下个馆子，得跟他妈妈和姑姑要钱。从老太太手里要钱他倒没觉着寒碜，主要是不好要，他能要出钱的惟一理由是“要处女朋友”。也的确，四十大几的大连还是光棍一个。他妈替他着急，只要是为女朋友的事，要钱从不打绊子，但总是没有结果。问原因，他说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懒求。”

大连长相不错，能耐也不小，就是嘴里没实话。哪个姑娘，哪个小寡妇也不愿意嫁个说话云遮雾罩，两脚踏不到实地的爷们儿。

有一段时间大连常上我们家来，来了也不太有人搭理，谁都不待见他，他也不在乎，都知道他没正经事，是混饭来了。特别是我们家的厨子老王，打心眼儿瞧不起大姑奶奶的这个儿子。这个大连，肉包子能吃九个，炸酱面能吃三碗，吃饱了也不走，坐在门道里跟看门老张神聊，东南西北，话题不断。

大连说他睡觉的枕头让耗子咬破了，从破窟窿里竟然掏出一张字条来，上头写着：“此枕卖与傅家，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被鼠咬破，特记之。东坝河庞澜周。”大连说字条上的日子时辰和枕头破的那天一丝不差，他也是姓傅的，只是不知字条上提出预言的“庞澜周”是谁，是哪个年月写的，这个庞澜周何以能有这么大的能耐，竟然能做到料事如神。老张是个好事之人，听了这话就说，那你就到东坝河找去呀，东坝河离这儿也不远，一个钟头就到了。要不我跟太太说一声，陪你去。

大连说，还用你陪，我早去过了。

老张说，找着了？

大连说，当然。

老张说，快给我说说，这事有点儿意思。

大连说，不是有点儿意思，是太有意思了。

老张赶紧给大连的茶碗续水，问大连还吃不包子，要吃他还可以到厨房去拿。大连说他不吃包子。老张说，不吃包子就快说，庞澜周到底是谁？

大连说庞澜周是东坝河小猪店人士，三百年前就死了。老张说，这么说，这个三百年前的人早就预料到这个枕头三百年后归你枕着？

大连说，要不怎么是高人呢，人家是入了“理”的。

老张问入什么“理”，是不是白莲教？大连说白莲教早过时了，人家信的是真理，信了真理，上三百年下三百年，六百年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。

老张说，可惜没让庞澜周给我算算什么时候发财。

大连说，我见到的是庞澜周的后人，叫庞天然，庞天然说他们家的老先祖早就留下话来，说三百年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有个叫傅大连的人会找来，这个人有仙根道骨，可以作为道门的点传师。

老张说，就您？

大连说，我怎么啦？我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你以为我就会吃九个包子吗？告诉你，我的本事大了，不张扬就是了。

老张说，得，您别跟我们凡夫俗子一般见识。我斗胆问一句，这点传师是庞澜周跟前的哪一路神？

大连说，点传师是人与神之间的联络员。比如说你，要想成仙就得通过我引见，要不然你上哪儿找神仙去，神仙从你跟前过去你都不知道。

老张说，我不想当神仙，神仙有什么好，吴刚在月亮上头也是神仙，一个人，见不着老婆孩子，自己还长命百岁地永远不死，闲得没事砍树玩儿，还不如我在人间看门呢。我就是想发财，有了钱回家置点儿地，盖院房，买俩大牲口，雇仨伙计。大小子支应门户，二小子上天津跑买卖，三小子上北京念书……可惜就是缺钱哪，叶家这点工钱将够我自己的嚼谷，哪怕我手头有三百大洋，我就知足了……房可以晚点盖，牲口可以不买，仨小子先跟着我在地里刨哧……

老张徜徉在他的理想中，这是他日日在炕上做的梦。

大连说老张的想法太浅薄，不管怎么着，先要入道。入了道才能得真传，得了真传就能点石成金，到那时候，还在乎什么房子地，想花钱，照着场院的石头碌碡一点，碌碡就成了金的。

老张说，怕的是到时候发愁的不是钱怎么花，是怎么把这个大金碌碡掰碎了。

老张问大连入的是什么道，大连卖关子地说，子曰：参乎，吾道一以贯之！

老张不解，大连说，你怎还不开窍，就是一贯道嘛！

老张问一贯道信奉的是哪路佛爷，大连说是“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

界十方万灵真宰”，简化了说就是“无生老母”。老张说，一个老娘儿们家，不在家抱孩子，出来跳大神儿……

大连说无生老母可不是跳大神的，那是个救世济人的。老母最近很忙，因为天有异兆，颐和园昆明湖旁边的铜牛眼里流出了血，鼓楼西南角每天下午冒黑烟，太和殿挑檐上的琉璃饰件“仙人指路”不翼而飞，潭柘寺后山洼里出了一只长角的长虫……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了天下要大乱了，刀兵灾、瘟疫灾、饥馑灾、蝗虫灾接踵而来，要刮七七四十九天天罡风，飞机飞不起，大炮打不出，天塌地陷，尸骨成堆，鲜血成河，明智者赶紧入道，受老母护佑，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，否则就难说了。老张说，那叶四爷这么大的家当也说完就完了？四爷、四太太也在“尸骨成堆”里头？

大连说，四爷这点家当算什么，溥仪溥大爷的家当大不大？现在照样众叛亲离，抛家舍业，蹲了外国的监狱，落了个面对四壁、一无所有的结局，小命在人家手里攥着，人家哪天不高兴，扔给一条白绫子，二话不敢说，就得乖乖儿给人上吊。

老张是个胆小的人，一听大连的话立马就觉得世界末日来了，把门道的穿堂风认作了飏飏阴风，把树杈上的乌啼认作了最后的挽歌，他最担心的就是手里偷偷攒的八十块大洋的私房钱变不成房子和地，如若“血流成河”，他什么理想都完了。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，老张在大连的撺掇下一块去了一趟东郊的东坝河，亲眼目睹了一回一贯道的“扶乩请仙”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回来见谁跟谁说他见到了济公，济公还跟他说了话。问说什么了，老张拿出一张字条，说上头都写着呢。我们家很多人都看过那张字条，黄黄的一张纸，鬼画符般地描着几句“乩语”，说的是：

混混沌沌常如梦，今日幡然入道门。

共得横财共珠珍，禾苗久旱降甘霖。

老张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叙述东坝河的神奇境域，一座清静的院落，三个十来岁的少年，少年们面目清秀纯净，分别叫做天才、地才、人才。堂上一盘精细的黄沙，众人围沙而立，在大连的引导下，老张给高处的无生老母牌位焚香叩头，报出自己的生辰八字，有人写了，传到坐在太师椅上的一个肥硕男人手里，一通仪式之后，便是扶乩请仙了。大连说这些仪式专门是为老张一个人做的，呆会儿神仙下界也是专为老张一人而来的。老张就很感动，说最好能请下玉皇大帝来，玉皇权力大，能做主，说话算话，真要请下个牛郎来，屁事不顶，只知道耕地，那样的神跟庄稼人没两样。大连让老张不要乱说话，说谁来谁不来由不得凡人，过路的神灵成千上万，哪个不怕耽误工夫，愿意弯一下路就是哪个。

结果是济公来了，老张知道济公就是济颠僧，一个没有正经的疯和尚，心下便有点儿不满意，可又不能让疯和尚回去再换一个来，万一来个猪八戒还不如这个和尚呢，只好老老实实很紧张地跪在砖地上等着济公指明前程。眼见着三个少年进入了一种迷幻状态，眼神游离，动作缥缈，着实手舞足蹈了一番后，围着老张转了起来，一个圈又一个圈的。老张被扬起的尘土呛得只想打喷嚏，想的是济公大概有日子没洗澡了。转够了，三个人在沙盘前站定，焚香烧表，向半空扬洒清水，然后“天才”扶乩笔在沙盘上画字，“人才”推沙报字，“地才”抄写记录。一通忙活之后拿出了济公给老张的这篇乩文，老张对上面的解释一概闹不明白，只记住了“横财”两个字。

从那以后，老张日日盼着天上掉馅饼，地上捡金砖，人道交给点传师的三十块大洋心疼归心疼，却买了全家的安全和财路，当全中国都尸横遍野、万户萧疏的时候，独独他们老张家还能茁壮地活着并且财源茂盛，这的确是件很占便宜的事。

大家都说老张上了大连的当，老张却执迷其间，说三十大洋买了全家十一口人的平安，不贵。

一贯道是敛财道，大连自当了点传师后如鱼得水，那些“乩文”都是他编出来预备下的，然后让“三才”背了，看人下菜，随机使用。平时收取了道徒不少的功德费、供果费、印书费、施茶费、月助费等等，要了老张三十大洋绝对是看在熟人面子上便宜了老张，关键是老张不羡慕神仙，不想超脱，只是想跟神仙对对话罢了。东华门有个卖估衣的庞二爷，托大连给他故去的爸爸在天上谋个混吃混喝、不干实事儿的位置，大连竟收了庞二爷五百现大洋……解放初期，“度大仙”成了一贯道重要的“工作”，某点传师度了六百多大仙，骗了黄金六千多两，这么一比，大连还算好的。

大连被我们家划为“不受欢迎的人”，他来了几乎没人搭理他，就是我母亲面子那么软的人，也能耷拉下脸来，不冷不热地说出“叶家不信歪门邪道，以后少上门”这样的话。仆人刘妈说，这个大连哪，跟他的兄弟小连整个是俩性情，都是大姑奶奶的儿子，竟拴不到一个槽里去。

大连从不打听小连的事，就好像从没有过这么一个兄弟。小连当了大官也没过问过大连的事，就好像从没有过这么一个哥哥。一九六六年，大连从监狱里放出来了，他在里头整整蹲了十五年，一天也不少。出了狱的大连老了，话也少了，我们家老七说大连的话在前些年都说完了，那时他的话太多，连坑带骗，终日嘴不闲着，人这一辈子说多少话，写多少字，吃几碗饭，老天爷都安排好了，是有定数的，前头说够了，后头就没了的说了。大连在胡同口给人修自行车，手艺不错，倒也自食其力。逢有人说他长得像某某大官，他也不言语。